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汤一介主编



# 人间关怀

王守常 钱文忠 编  
—— 20世纪中国佛教文化学术论集  
HENJIANGUANHUIHUAIKESHILUZHONGGUOFUJIAOWENHUA XUEJESHULUNJI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B948

38

0101477

DH35/28

# 人间关怀

——20世纪中国佛教文化学术论集

王守常 钱文忠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关怀：20世纪中国佛教文化学术论集/王守常，  
钱文忠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0  
(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汤一介主编)  
ISBN 7-5043-2940-1

I. 人… I. ①王… ②钱… III. 佛教-宗教文化-  
中国-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397 号

### 人间关怀——20世纪中国佛教文化学术论集

编者：	王守常 钱文忠
责任编辑：	王平
责任校对：	陈丹桦
装帧设计：	郭运娟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502 (千)
印张：	22
版次：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册
书号：	ISBN 7-5043-2940-1/B·69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编委会

主编 汤一介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常 王宗昱 孙长江

孙尚扬 汤一介 李中华

# 总 序

汤一介

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继先秦、魏晋之后的第三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大体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阶段来进行。“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定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的时期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原有的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

在先秦时期，由于周王朝解体，各地诸侯国竞起而引发出“百家争鸣”文化多元发展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正统儒学的衰落，玄学的兴起和印度佛教的传入，逐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冲击，并进而造成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而二十世纪（或者更早一点）的中国文化又一次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原因或许更为复杂，其中既有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需求，又有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有全球文明危机所带来的诸多忧虑与困惑。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不仅非常丰富多彩，而且相当深入、相当充分、相当透彻。

在这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回顾过去，瞻望未来，在中国文化学术方面有许多事要我们去做。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非常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总结。而在我们能对这个世纪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合乎实际的、有科学意义的总结之前，对这个世纪以来各个学术流派、各种学术思潮的资料作一番整理工作应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们组织编选了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由于人力和财力的限制，我们计划分辑陆续编选出版。第一辑四种已于1995年正式出版，分别是《国故新知论》，所编选的是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派的论著；《知识与文化》，辑录了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我国学术界颇具影响的张东荪的论著；《走出东方》，所选的是著名学者陈序经有关“全盘西化”的主要论述；《时代之波》，是抗日战争时期闻名一时的战国策派的论集。我们第一辑之所以推出这四本论集，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这几种论集所反映的文化学术思想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被人忽视了；二是这几种论集中所辑录的论著在今天已经十分难以见到，给相应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困难；三是这几种论集均围绕着一个论题而展开，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系统性，便于研究这一论题的学者利用它们从事研究活动（第一辑编选的四种论集表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三种不同力量：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当然是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派，学衡派的“国故

新知论”则无疑是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派；张东荪的“多元文化论”可以说是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派；战国策派的“权力意志论”，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游离于上述三派之间。这几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不同时期都起过不同作用，因此，要全面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对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都应作认真的研究)。

也是基于这几考虑，我们这里作为丛书第二辑推出的四本论集，编选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宗教界人士的文化学术论著，分别是：《人间关怀》，辑录了佛教界人士的文化学术论著；《本色之探》，是中国基督宗教的文献选编；《追求真宰》，收录了中国伊斯兰教教内人士的主要论著；《超越心性》，选录了道教界人士的文化学术类作品。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多元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界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同宗教的教内人士针对现实提出的种种挑战，从各自特有的角度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回应。佛教界人士致力于佛教的普世化运动，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主张佛教应为现实的人生服务；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积极推进基督宗教的“本色化”和“中国化”运动，力图使中国基督宗教顺应时代潮流，在新形势下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伊斯兰教徒在强调自己独特信仰的同时，非常重视创造性地吸纳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并注意保持教义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和谐一致；而道教则以超越心性的追求，表达了一种对生命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教内人士的这些文化学术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参与并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几本论集的整理出版，使大家能够充分认识宗教文化学术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真切了解教内人士的思维特征和学术思路，体验他们的文化热情与

道德信念。也为学者们的研究活动提供些方便，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学术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的编选、出版工作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在编选、出版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许多学术界同仁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并承蒙许多作者亲属允许使用他们拥有著作权的作品，在此表示感谢。第一、第二辑的出版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我们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项工作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同时也希望继续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 近现代佛教复兴的断想

## (序一)

王守常 钱文忠

佛教一向被称为世界性宗教，核以史实，则多少有些大而化之的嫌疑。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较少排他性，它以法身佛应众生，又为无尽化身佛和应身佛。这一神与多神的可容性与可塑性之大，竟至时常使人怀疑它是否可以安然列入宗教之。众所周知，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在根深蒂固的印度教和汹涌而入的伊斯兰教夹击下，早在约八百余年前就销声匿迹了，印度之外诸国或地区的佛教尽管失去了原初根源，却在各自本国文化的土壤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其中固然有许多历史机遇，但佛教不预设超越众生的造物主，且不舍世间的理念实在是最为主要的原由。我们可以发见斯里兰卡佛教、缅甸佛教、泰国佛教、韩国佛教、日本佛教、中国佛教、藏传佛教乃至和阗佛教，各显示出本土化色彩的生机勃勃之异样形态。即使在公认留存印度色彩最浓的雪山之国尼泊尔的佛教中，表示“僧人”的字在尼瓦利语 [newari] 中也已无踪迹了，代之而

起的是密宗化了或者说本土化了的“金刚法师”[vajracarya]。更耐人寻味的是，约东汉年间传到中国的佛教，到了中唐之后，禅宗一枝独秀却成为“教外别传”。这“夷狄之教”以追怀始祖的生命体验，却又扬弃了印度佛教的形式，以其内省、自主、自信的宗教践履的体证方式融入中国哲学、艺术、文学。

中国佛教中经隋唐三百年鼎盛，至五代始法运衰息，宋初以后禅宗、天台、律宗、华严，多兼弘净土，此合行诸宗，再至晚明清初，禅净双修为归，差不多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切法门。佛门内不辨宗派界限，佛门外则与儒学同气相应。宋明理学入佛门操戈，浸假孔孟道统而成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佛教在学理方面的发展举步维艰，只有把出世转为入世，一方面浸入民间，参与生活，给人无穷希望的弥勒与观音分别成为动乱与和平的要角，享受着人间的香烟与顶礼；一方面以“忠义心”解释“菩萨心”，为国行法，护佑军旅，声援民族之战。

1873年，在斯里兰卡科隆坡附近，举行了一次长达三天的公开辩论，一位僧伽罗高僧最终战胜了卫理公会牧师。这场颇带东西文化对垒色彩的辩论的最终结果被广为报道，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873年也就因此被视为近代世界性佛教复兴的标志年份。“世界性”在这里倒是合适的修饰词，因为不久之后，在新大陆与欧洲都出现了僧伽，随之佛教研究，尤以重视文献考据、文字训诂，成为欧日学者兴趣所在。

然而，同样也是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佛教也渐渐复苏，在践履上归心净土，在妙契佛理上精修法相唯识学，士大夫之间日渐流行的佛学热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主要特征。的确，我们至今尚未找到中国佛教复兴原由与科隆坡辩论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无可否认，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形式与轨迹。但是，至少有一点须三思的，那就是，佛

教复兴差不多均是在已沦为殖民地、即将沦为殖民地或深切感受到西方殖民势力威胁的国家与地区中发生的。

这也许是各国佛教复兴运动为数较少的共同点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必然是带有明显抗拒西方文化影响色彩的社会运动，佛教自身的发展倒是只能位居次要。如果不是无关紧要的话，不再会有“佛化虽隆，多游辩慧”的状况了。

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发生的。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之门，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面对西方的宗教、政治、文化发生根本动摇。社会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欲求安心立命之所，遁逃而入佛者有之；栖心内典，真学佛而欲求民族解脱大道，赴以积极精神者有之；亦有先期厌离世间，倾心出世，转而念救拔众生，出世又不舍世间者。相对于在经世思想、公羊学鼓噪下的社会改造运动，佛教复兴只是一“伏流”。不过这一“伏流”在20年代至40年代成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它引动了众多新学人士的兴趣。在“振兴佛教”的和声下，居士、僧徒与新学人士都希冀以再度发挥佛教整合社会文化思想的价值功能。

我们看到，希图振兴佛教的首要步骤，即是把衰微的佛教重新拔擢到一个超越西学的至高位置，无论僧徒，亦或居士、新学人士都有如是共识。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可谓代表，于是居高临下评说世间万法就似乎有了可能与理由。还有不少人反复论证佛法就是济世灵丹，王恩洋题其文曰《佛法为今时所需要》，梁启超径直以《佛学时代》为题，呼唤新佛教徒再现；其次，为了一致对外，力争同盟儒学，移樽就教，不顾与“超越”的矛盾，用合并等同的方法为佛教争得中国文化的主流位置，弘扬净土一宗，推行念佛法门的印光法师有《儒

释一贯序》；再次，不断对道德、人生、卫生乃至人死之际应做之事发表指导性意见，不惜冒着科学至上的年代被人讥笑为迷信的巨大风险，有圆瑛之文《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有周叔迦的《从佛教徒的人格说起》等。为使佛教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育人才，改革推行僧教育，则有佛教复兴的先驱人物杨文会创办的佛教学堂，其以出世与世间法并无二致理念，分教内教外二班，宣化佛法，若僧侣太虚、释仁山、智光，若居士欧阳渐、梅光曦、李征刚，若新学人士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出其门下，亦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振兴的重要分子。同样不满意僧侣教育水准低劣的太虚则以创办“中华佛教总会”的组织方式，并倡导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这位追逐新潮思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太虚主张佛教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新形态。这“新形态”就是“学佛先从做人起”，关注宇宙人生的“人生佛教”。其后，印顺的“人间佛教”倡导“人本佛教”也是要佛教为现实的人生服务的唱和。

总而言之，近代佛教复兴是一个极具意味的社会现象。这里选编的诸篇文章，主要是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中国佛教如何普世化，亦即近代佛教面对“现代性”问题的某种索解反省。事实上，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援引西方文献学方法整理梵、藏、汉文佛经的学术研究及回应西方哲学而从佛教汲取哲理的哲学原创活动也应关注。这本在前人基础上编成的选辑希望能为近代佛教研究提供些帮助。

是为序。

1998年6月

# 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

## (序二)

黄夏年

二十世纪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值得一书的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中国历史经历了林林总总的变化，对社会和人心都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回顾历史，我们将有很多启示，同样也有很多感慨！

佛教是已有二十五个世纪之久的宗教，它传入中国，也近二十个世纪了。但是除了隋唐盛世鼎盛期的佛教之外，二十世纪的佛教也许在二千年的历史上，应该有一个新的说法，至少它在佛学的研究和佛教文化的层面上表现出它的鲜明的新个性。

二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在文化建设上是灿然可观。一部大藏经达二亿字以上，它是中国僧俗两界人士努力奋搏的结果。加上至今还没有收入藏内的文献，据专家估计，应有四亿字以上，如此浩瀚的经书，已经了不得了。但是如果再加上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的佛教著述，其字数无疑是已经无法统计了，所以要

编纂这样一部新的大藏经总汇的话，不仅时间漫长，而且工作量之大，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说它近乎不可能，我想并不过分。

历代人士译、撰、编了大量的佛家著述，但是作为“佛学”二字来讲，也许应是从近现代开始。佛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佛教博大精深，把它当作学术来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在涉及到具体操作时，“佛学”往往又与“佛教”相混淆，故本世纪曾经有人提出将“佛学”与“佛教”加以区别，概言之，“佛学”是指一般学术层面上的事情，即学术的活动；“佛教”是指宗教，即教化的活动。本文所谈的“佛学”，就是指学术层面的学术意义的活动。中国佛教还应该包括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三大部分。就是佛学，又牵涉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所以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谈清楚的，它应该是一本书甚至数本书才能够加以说明的。本文主要以介绍汉语系佛学研究的情况为主，旁涉其他二系，并以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为重点，祈盼读者方家谅之。

## 一

要谈到二十世纪的佛学研究，首先是一个分期的问题。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佛教属于社会的一个部分，它的兴衰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佛学也是社会活动中的一个部分，它同样依赖于历史，离不开历史的进程。笔者以为，按中国百年的历史发展而论，中国的佛学研究应该分成大小二个部分。所谓“大”，就是说从大的阶段来看，中国佛学主要分为二期，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是第一个阶段；五十年代初到现在是第二个阶段。所谓“小”，就是说在大阶段内还可以分解成若干个较

小的时期，如在第一大阶段里可以分成二个时期，本世纪初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即到一九三七年为第一个时期；一九三七年以后到一九四九年为第二个时期；在第二大阶段里，也可以分为二个时期，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八年为第一个时期，一九七八年到现在为第二个时期。站在世纪之交，回首历史，应该指出，第一大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和第二大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为二十世纪佛学研究的繁盛期，换言之，二十世纪的首末二端为佛学研究的重头戏，而且这前后两段时间都在30年左右，这又与中国社会思想在本世纪内的发展步伐是一致的，由是体现出佛学研究与历史发展同步性的特点。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下一个世纪，这种发展态势对佛学研究能顺利地进入下一个世纪，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人来说，它确实是令人鼓舞的一件好事！

作为佛学研究，在任何时代，都体现在“文字般若”上。佛教之所以能够传世不绝，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性，而这种文化性体现在学术的层面，就是它的著作、思想等等精神文化创造活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佛教没有强大的译经活动，没有那么一批有学识的高僧和学者一代又一代努力疏释不止，佛教就不会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谈不上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佛教文化的继承性，才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命脉，如果佛教没有了文化，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本世纪以来，能够荷担弘法，著述立说的人，仍然是一些受过教育，拥有一定文化，尤其是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人，按照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和研究成果来看，本世纪上半叶，无疑应该分为如下几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来自僧伽界的一些

僧人学者，如释太虚、释印顺、释圆瑛、释巨赞等一代高僧大德。第二个群体是来自于信仰佛教的一些居士，如欧阳竟无、吕澂、唐大圆、王恩洋等俗信者。第三个群体是来自于学术界的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胡适等名家。以上三个群体，均有着各自的研究特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同时也出版各自的佛学研究刊物，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互相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始终存在，当然在学术观点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歧异，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对立。这种现象应该属于正常的现象，既是学术研究，必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只有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才能引起互相争论，学术研究就是在这种争论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争论，只是死水一潭，学术研究就谈不上前进了。

既然“文字般若”显得如此重要，回首本世纪的佛学研究就应该从出版事业开始，百年来，有关佛教的出版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在这些众多的佛教出版物中，除了大德讲经说法和古籍再印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研究性的佛学刊物，其具体数字是多少，也只能有一个大概而已。台湾著名僧人释东初法师曾在其著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谈到本世纪上半叶佛教出版物情况：“我国佛教发行各种刊物，首推民国元年之《佛学丛报》，而历史悠久者，则为《海潮音》月刊，已有五十五年之历史。此外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报，全国各省各县不下数百种（据日人考据多达三四百余种）……。”<sup>①</sup>东初法师在书中列出了五十五种佛教期刊，但在笔者所掌握的目录<sup>②</sup>中，至少

---

① 释东初著《中国近代佛教史》第二三七页至二三八页。台湾东初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② 此目录系华东师范学院历史研究所何建民博士提供，特此鸣谢。



有名可考的达一百八十种，这个数目与今天大陆和香港、台湾几个地区的佛教刊物总和，恐怕不相上下。

至今在众多的刊物中仍推历史悠久的《海潮音》为最。这份刊物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百年来中国佛教和佛学研究的窗口与见证，因此要了解中国百年佛学发展史，不得不格外重视它，尤其是它在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一阶段里，刊出了大量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中国佛教改革家、著名僧人、社会活动家释太虚大师时，不得不翻阅这份已有近八十年历史的刊物，因为太虚大师的许多重要文章，大部分就刊登于此。

一九二四年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办《内学》年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纯佛学的学术刊物。它在著名居士、学者欧阳竟无的领导下，以专门刊出纯佛学理论的文章而垂名于世。欧阳竟无在第一辑《叙言》中写道：“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不如是而有学……天下有如是学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咸其一致，如理事者在一己，如量者发由乎人，不可以不审。”<sup>①</sup>当代中国许多有成就的佛学家和学者都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这份刊物至今仍可以被视为二十世纪以来最有价值、最精到的佛学刊物。如今这份刊物发表的文章已经被重复印刷和出版多次，举凡收集本世纪最有价值的佛学成果，必离不开此刊。可惜的是此刊仅办了四期以后就不再出版了，以后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文章以《内院杂刊》的形式继续出版，当然这份《内院杂刊》的质量也是属于本世纪学术品位最高的刊物之一。《内学》代表了中国居士佛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如要了解近代中国佛学的早期发展及

---

<sup>①</sup> 《内学》第一辑，支那内学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初版本。